

内江縣文史資料

(第七期)

内江县志编纂委员会
政协内江县委委员会 编

一九八三年十月

目 录

同盟会内江籍会员题名录(二).....县志办资料室(1)

张善孖简历(1) 余 切(公孙长子)简历(1) 余 龙简历(宗承,2)
余 清烈士事略(谢海鹰,2) 余燮阳简历(农治,3) 潘子光简历(王世杰,3)
叶敏斋先生二、三事(刘建纯,3)

入党和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片断回忆.....吴 梅口述 成鸿鹰整理(4)
留比学者李山甫教授与周剑秋百岁老人.....李幼瑜(6)
李仲权先生行状.....王恩洋(8)
李仲权先生办学、治学记略.....吴星海(9)

医 名医熊其言及其医学著述《宿食论》.....郑邦达(12)
林 著名中医段训、段静庵父子.....《凌家区卫生志》(15)

·江城书画舫· 五、公孙长子的魏碑方笔与双钩、飞白(世俊,16) 六、余燮阳先生的榜书和宗法《兰亭》.....(农治、世俊)(16)

·汉安诗词丛话· 十一、张善孖的逸诗和“诗偈”手卷.....冯修齐(18)

〔花萼琐记〕(四) 乡学林著述钩沉(中).....洪 庐(19)

《内江县洪灾志》征订启事(27)

▲图片:张善孖为喻培伦烈士夫妇画像(封二).....公孙长子双钩手册(封二)

余燮阳摩崖题字及斗方单条(封三).....王恩洋为李仲权画像题赞(封三)

熊其言《宿食论》、《药玄类诗钞》书影.....(封底)

同盟会内江籍会员题名录（二）

张善子简历

张善子（善孖），本名正兰，学名张泽。出生于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幼年时期即在家随母学画，并入私塾，习举子业。1899年十七岁时，曾参加大足余栋成攻打天主教堂的爱国活动。1901年去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科攻读。1905年于日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建立的同盟会。1907年回国后，积极参与同盟会组织的革命活动，参加了四川爆发的武装起义和保路运动。1911年民国建立之后，曾进入军界，任四川陆军第一师第二旅少将旅长，讨袁失利，被袁通牒，复出亡日本。1917年倒袁后回国，曾出任乐至等地方知事。1922年调北京先后担任过总统府咨议、财政部参事、国务院咨议，并去察哈尔考察和任商都县知事。1926年后，退出政界，以习画为业，尤长于画虎，在题画时，多以“虎痴”署名。1935年曾任教于南京大学。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率家内迁回川，曾参加国家救济委员会工作。并于1938年底将其所绘画件和与他八弟张大千共同所绘的作品一百八十多件，去欧、美等地举行义展，经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举办了一百多次展出。共募集上百万巨款，捐献国家，为抗日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张善子先生于1940年10月，以糖尿病不治逝世，安葬于重庆市歌乐山，享年五十九岁。

余切（公孙长子）简历

余切（公孙长子），名南陔，字培初。清、光绪八年（1882）出生于四川内江县同福场七盐井。幼年随父余夷介在家塾课读，继受业于资中周孝怀（善培）先生，国学功底深厚。1900年在泸州川市经纬学校就读，因受新学影响，寻求救国富强之路，于1904年原拟力图去日本留学和报考成都武备学校速成班学习，均未果。1905年乃与彭县杨钧、肖光前、犍为汪泽等在双流簇桥开会，组织大同军，推举余切为元帅、杨钧为军师，为推翻清朝帝制，举行彭县起义。是年11月17日，大同军与彭县团练堂勇及什邡、新繁、崇庆县各团练，于彭县牧马河展开激战，大败团勇，并乘势焚烧了思文场、河坝场的教堂。旋以起义事败，脱走成都，再转至荣县长山桥等地教书。1906年，由同校教师黎清瀛的介绍认识了熊克武（锦凡），1907年由熊克武、黎清瀛的介绍，在泸州正式参加了同盟会。

余切参加同盟会后，分工负责川南会党的组织发动工作。1907年5月，省同盟会党人在成都开会，决定派余切等，内结合新军弁目，外招致民间会党，并拟定于十月借慈禧生日会府朝拜日，举行成都起义。并派余切主持军事和对会党的领率指挥。亦因事泄败露，同盟会党员杨维、黎清瀛等多人被捕，余切得逃脱，被迫出走山西等地区。1908—1910年在出走甘

肃、蒙古、山西时，仍积极继续参加国民革命的工作和活动。1911年9月还同四川同乡党人吴子莫（汇之），参加了山西太原的晋军起义。

1913年余切回到四川，立即参加了熊克武组织的反袁斗争，在颜德基部任参谋长。倒袁后，不满于军阀的割据和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遂退出党政军界，息影书坛，长期从事鬻字为业。1942年病逝于重庆。

余 龙 简 历

余龙，字跃门。四川内江县人，出生于清末。

1906年，在成都参加了清室举办的四川陆军新军弁目队学习。1907年经其侄余切（公孙长子）的介绍，加入同盟会。并被组织派遣，在弁目队中发展同盟会会员，为发动武装斗争积蓄力量。

1907年10月，余龙参加了同盟会在成都组织的起义斗争，因起义事泄，致起义领袖中杨维、杨钧、黎清瀛、黄方等成都起义“六君子”的被捕。余龙以未暴露，得免于难。

1908年春，余龙改转入清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炮兵科学习。在学习中，积极传播革命思想，继续开展推翻清朝帝制的政治活动，与步兵科同学谢炯等，在学员中组织革命秘密团体，并以拜把（结金兰）方式，暗中联络了各科学生二十余人。

1913年8月，熊克武在重庆兴师讨袁世凯，余龙与王兆奎、王天杰等曾共举义兵参加讨袁。（余龙逝世后，余切撰写有《余龙行述》记志其生平）

（宗 承辑）

余 清烈士事略

余清，字芬圃，内江县人，出生于清末光绪中期，1907年同其胞兄余切（公孙长子）、余节与黎元振（清瀛）、杨维、汪泽等，在成都秘密组织起义。不料事泄，黎、杨二君，被清爪牙四川都督赵尔丰逮捕，并牒捕余切。余切逃亡出走甘肃、陕西。余清乃同余节、汪泽等分别潜往嘉定（乐山）、资州（资中），继续积极进行秘密的联络、组织活动。俟因汪泽在犍为被该县县令捕获，余清、余节遂夜奔井研，谒商熊克武，张培爵、程纬诸人，准备在嘉定举行起义。并派余清先至五通厂去侦测和联络。

乐山、马边、屏山诸役，清兵均以势优获胜，程纬亦遇害。余清、余节仍只得暗地奔走于嘉、眉、邛、雅等地。

旋四川保路运动兴起，余节去成都从事文字鼓吹工作，余清回内江本县，倡组同志军，集合同志军五百余人，直驰攻省城成都。行军至资阳，为当地防军所阻。余清因与周鸿勋合军，余清为参谋。清室随调滇军入川，会同川清军镇压四川保路风潮，周鸿勋与清军会战中遇害，余清率散军，说合川南民军司令长黄芳，同击入川滇军。是年冬月初二，余清率部出战于五通时，不幸被执，壮烈牺牲，时年仅二十岁。其妻子年十九岁，愿为守节，抚兄之子祧祀。

（烈士事迹载《蜀中先烈备征录》卷二）

（谢海鹰 辑）

余燮阳简历

余燮阳，字哲徽，内江县人，出生于1877年（即清、光绪三年）。求学时期，曾肄业于成都尊经书院，考上了清朝末期的秀才。后以幼年习字韶秀，由简阳霍庄寿之父（书院的掌院），推荐到北京清政府军机处任章京（即书吏、文书职属），因清军机大官荣禄，曾受业于霍庄寿之父霍老先生。

余在京任职不久，适京师法政大学堂开办，遂转肄业于京师法政学堂学习法政，曾与沈钧儒、黄默涵、谢盛堂诸人同学。毕业后放湖北任知县，以革命党兴，武昌光复，在北京参加了同盟会，乃未赴知县任，另接受新任务回川工作，曾派至西康打箭炉（康定）为西藏宣抚委员。成都法院开办，调成都法院推事，旋调重庆法院任庭长。后以不合政途，退出政界，在重庆挂牌作律师，并兼事书法为业。在其作律师时，秉性正直，多能为社会积习纠纷伸张正义，辩解屈直。后终因年老患高血压，行动不便，于1935年即回内江静居调养，专门以研习书法、鬻字，安度晚年。1943年病逝于家，享年六十六岁。（农治述）

潘子光简历

潘子光，字树恒，内江县万家场麻柳湾人。生于清光绪丁亥年（1887年），家世以农为业。幼孤零，六岁时即死去父母，在祖母的抚育下，念了几年私塾，十三岁时曾被送去自贡一盐商家当学徒。因平时喜听、看洪秀全等太平天国起义的故事，早年即参加了推翻清朝帝制的国民革命部队行列，曾经同吴玉章等革命党人一起，参加了广州起义和辛亥革命，并加入了同盟会。因打仗勇敢，战功卓著，辛亥革命后，二十四岁，被提拔担任过犍为县的盐场知事，随后还任过四川省驻京的盐务代表和顾问。因不合于国民党蒋氏政权的专制统治，在抗日战争前夕，即早被解职离去政界。

1943年，潘子光从重庆回到内江故乡后，热心、致力办理地方桑梓公益事业。一面联合族人，将潘氏祠产，在万家场兴办私立“荣阳小学”，一面亲自筹资、贷款兴办水利，在内江县西区潘家坝地方，修筑了一条长达数公里的潘家堰和桂溪堰，蓄水灌田，使农业生产受到裨益。

1944年至1950年，潘子光曾任职四川省银行人事室专员。退職后，于1951年病逝于成都，卒年64岁。

（王世杰 辑）

叶敏斋老先生二、三事

刘建纯

叶敏斋，字谨述，又名焕章，一八七七年出生于内江县观音乡佛岩寺尹家冲。叶先生有五女二男，约于民国二十年前后病故于家。

叶先生在满清光绪末期曾考取廪生，因见满清官吏昏庸，慈禧女后专权，政府腐败无

能，帝国主义横行霸道，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愤而弃官，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积极参与推翻清王朝、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一九〇八年四月，他参加了黄明堂、王和顺等人在云南河口发动的起义。后起义失败，他继随起义军退到了越南，此间与胡志明主席曾早年相识。一九一一年满清政府被推翻后，见国内局势混乱，军阀割据，人民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故而无心参加政治活动，便决心退居故里，置身教育，办学育人。

叶先生在教书舌耕生涯中，积极宣传破除封建迷信，在家里主张女儿不缠脚，不穿耳，剪短发，穿男装，与男同志一样参加社会活动；女儿结婚他建议不讲排场，婚事新办；还主张文人读书，也要从事劳动，不能只求当官。先生本人生活十分简朴，常穿草鞋，种地、挑水、砍柴、养牲畜样样都干，虽是文人学者，但其思想行为，却完全呈现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一九二一年他在平坦乡小学教书时，正值川军内战，一天一支部队路过平坦，他去河边担水，被乱兵强拉去挑东西，叶先生正色解释：“我是老师，现正值学生考试，你们不能拉我走”。乱兵蔑视着他说：“那有老师穿草鞋担水的”。不管叶先生怎么辩解，乱兵横竖不放，后经校长派一工人将叶先生换回，这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

一九二五年革命形势高涨，内江革命人士黎灌英到东乡组织农民协会，宣传革命思想。叶先生又一次看到了希望，他积极参加、支持农民协会，主动将家里的留声机拿出来，于街头、乡间宣传革命和进步的新思想。并支持其长女庄伯、次女仲雅投身于革命事业。后来庄伯和仲雅成了内江早期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庄伯还加入了共产党，并与当时内江地下党特支书记黎灌英结了婚，成了内江地下党领导妇女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叶老先生在内江早期地方革命事业上，做出了很好的贡献。

（刘建纯 辑集）

入党和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片断回忆

吴 梅 口述

成鸿鹰 整理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洛川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全面抗战路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尤其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进步青年积极行动，通过办报、讲演、歌咏、话剧等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唤起民众；也有的青年由于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不相信，怀疑抗战能取得胜利，因此，虽有投笔从戎之心，但苦无报效祖国之路，处于徬徨之中。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我在富顺县读高中，经同学雷勋著介绍，参加了自流井盐务局职员闻化渔（我们当时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领导的读书会。这个读书会成员除我、闻化渔、雷勋著外，记得起的还有张丹书、黄友凡（世元，现重庆市委宣传部长）。读书会成员一边读

书，一边用通信的方式讨论国家形势，一边到附近的农民中去作一些抗日宣传活动。在读书会中，我们读了一些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的进步刊物和一些关于共产主义基本知识的小册子，如《大众哲学》、《共产党宣言》、《剩余价值学说》、《费尔巴哈论》、《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以及介绍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介绍陕甘宁边区、介绍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些小册子等。通过半年多的读书、讨论、面谈、深入农村，也就是通过化渔同志半年多的启蒙教育，我初步建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树立了抗日救亡必胜的信心，明确了投笔从戎之路——到陕北去，到延安去。学期之末我同雷勋著到自贡，同闻化渔、黄世元谈了不愿继续读书，准备奔赴延安的打算。

一九三八年春，我从家（内江县茂市镇菜子湾即现内江县万家公社梁家沟大队一小队）出走成都，筹措赴陕事宜，住在成都市东门外的小旅馆里，白天到图书馆读书，晚上写文章投稿，想通过稿酬凑足赴陕路费。这样过了两、三个月，不但没有积攒到钱，连日常生活都成了问题。正在我瞎碰乱撞，茫无头绪之际，三月中、下旬的一天，我突然在街上碰到了闻化渔。他在郊外的中和场小学教书，也正在做去延安的准备。我就到化渔那里住了两、三天。他见我经过读书会的学习和实际锻炼，思想已比较成熟，就于四月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便于开展工作，他还将我原姓名吴汝翊改为吴梅。从此，确定了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理想。

我在成都入党之后，仍要求到延安去。但因四川也需要人工作，党组织未同意我的要求，而决定派我回内江，通过各种关系发动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并告诉我以后组织上会派人来同我联系。

约五、六月份，我从成都回到内江，住在倒湾我亲戚钟宝珊（沱中学生，其弟系内中学生）家里，同时在北街子敦睦小学找了一个代课的临时职业。定居下来之后，我通过钟宝珊及其它熟人关系，串联了沱中、内中的一部分进步学生和一部分小学教员（如在倒湾的第七国民初级小学，就串联了陈德华等五个教师），准备成立一个救亡团体。那时的进步青年普遍热切希望到陕北，不能去的就在本地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串联了三十人左右。当时串联进步青年，一方面是为了宣传抗日，另一方面党组织也打算通过各种救亡活动培养一部分积极分子入党，壮大党的力量。（后来，确实通过救亡活动发展了一批党员，据现在掌握的资料统计，仅“内江兴华救亡歌咏话剧社”就发展了十三名党员——整理者注）

本着白区工作应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参见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一百九十四页）的原则，为便于立脚，我找了当时在本地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敦睦小学训导主任张盛彩，请他参加。在考虑团体名称时，我同张盛彩发生了分歧，张要取名“兴”华歌咏救亡话剧社，取“复兴”民国之意；我要取“新”，采“新中华”之意。考虑到便于在国民党县党部通过备案，我同意了用“兴”。张盛彩起草的剧社的组织章程，连发动群众抗日救亡这个旗帜都不鲜明，还在宗旨一条中写上了“信仰三民主义”，对此我很不满意。我同他争论说，抗日救亡团体，宗旨就是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不要写信仰什么“三民主义”，如要写上信仰“三民主义”，那么，现在国共合作，不是也应写上信仰共产主义吗？张以不写“三民主义”就不能通过备案为由，坚持写上了信仰“三民主义”这条宗旨。因此，我就另写了一个宣言，想不经国民党县党部批准，借剧社成立之机，以传单的形式发出。后来张盛彩可能仍以党部不准为由，扣下未发。在这个宣言中，我宣扬

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写上了人人动员起来打日本等思想内容，并明确提出我们能团在一块儿来做的，便是宣传工作，而我们选择的工作部门便是“歌”和“剧”的战斗形式。由于我当时年轻，且入党不久，缺乏地下斗争经验，在同张盛彩争论剧社名称、剧社条例及写这个宣言时，实际上暴露了我的共产党员的政治面目。

九月，“内江兴华救亡歌咏话剧社”于北街私立敦睦小学（现内江市第一幼儿园）正式成立，张盛彩任社长，我任副社长。这时及稍后，成都地下党组织为了加强对内江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重建党的组织，相继派了闻化渔、张丹书、谢碧芳（若英）、谢小蕴等四名共产党员回内江。这几名党员都先后加入了“剧社”，并分别串联了一些积极分子入社，使剧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这几名党员同志，实际上成了剧社的“中坚”力量，起着领导剧社的作用，直到剧社解散。

在筹组“剧社”的同时，我发现白马庙的温余波（时为沱中学生）有才华，爱国热情高，过去因受到谢碧芳同志的教育和启发，打算成立一个“孩子剧团”，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我积极赞助、并指导他们。“兴华救亡歌咏话剧社”成立不久，“内江孩子剧团”也相继成立了起来。在白马演出时，“孩子剧团”还与“剧社”配合演出。我调离内江之后，“孩子剧团”继续得到谢碧芳（当时任中共内江县特支书记）的领导，开展宣传活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他们还从内江出发步行到成都演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星芒报》、《新民报》、《新新新闻》、《川康日报》、《飞报》、《中央日报》、《党军日报》、《华西日报》等报刊，都报道了他们的演出情况。

三八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党组织将我调离内江，去自贡编辑中共自贡中心市委机关报——《正确日报》；三九年一月底或二月初，又将我从自贡调到富顺协助谢壁同志开展建党工作；四、五月，再将我撤到敌后抗日根据地，一直工作到四五年日本投降，随东干队从延安出发去东北参加解放战争。

整理者注：吴梅同志，出生于一九一九年，现年六十六岁。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抗战初期在内江、自贡、富顺等地从事过地下工作。一九三九年初夏，到晋东南抗大一分校学习、任教，后又到太行山抗大总校、延安抗大七分校任教及参加延安整风。一九四五年随东干队到辽吉（辽宁、吉林）省，参加省报——胜利报的创刊工作。后作特派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一九四八年后，曾任中共四平市委和锦州市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科长及党员管理处副处长、中共吉林市委书记处书记、吉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一九八三年，经中宣部批准光荣离休。

（吴梅同志现通讯处：吉林市农业大学。）

留比学者李山甫教授与周剑秋百岁老人

李 幼 瑜

先祖父李山甫，字仲魁。1880年，出生于内江县城，从小在家攻读旧学。1906年赴资州，参加清光绪丙午科州试，考取上秀才，随即到成都，就读于清廷举办之东文学校留学生预备班，攻习数学、物理、化学等理工科课程。在当时倡行兴办洋务，筹办修筑川汉铁路的情势下，一年后，1908年，乃由公费派遣至西欧比利时留学。到比国后，先在比利时LIEGE大学铁道矿冶系就读，1914年即考获比利时LIEGE大学矿科工程师文凭。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该校停办四年，遂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转入私立工业专科学校电机系继续深造，1918年结业，又获电机工程师文凭。复因海战，远洋航行受阻，至1920年始安全返回祖国。

回国后，1920—1924年，历任四川省政府参议，成都造币厂工程师、彭县铜矿局局长暨成都高师、四川省联中、四川高等工业学校和四川甲种工业学校等校的教师、教授，讲授地质、矿冶等课程。1924年任高工工学院院长，1928年任万县建设局局长，1933年任广东大学矿冶系教授，1937年任广西省政府参议（时李宗仁主持省政），1940年任国民政府平武金矿勘探队队长兼经济部技正。抗日中期以年老卸职回内江故居。

祖父李山甫平生为人耿直、刻苦，生活简朴。在留学期中，一人公费两人用，以祖母周剑秋亦于1908年相继赴比学习化学和美术，但并未因此影响其学习，而是更加勤奋。是当时30多名留比学生中，难能获得国立大学正式文凭的佼佼者。在回国执教和工作中，则更以学者风范，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从事于祖国科学人材的培育和实业的开发，如于学校教学时，每值假期，便率领学生赴川藏边境和川北等处，实地考察矿产资源，绘制矿脉图表，采集矿石标本，撰写学术论文。如于万县任建设局长时，身体力行，曾在万县近郊遍植桐树，并开办贫儿工厂，收容贫苦家庭子女和流浪孤儿。教以纺纱编织、刺绣等手工工艺，俾其能自立谋生，更有助于国家实业建设。就在抗日时期，年老回乡蛰居中，眼见交通封锁梗阻，国需民用物资生产、运输艰难，尤念念不忘科技的钻研，在家里很差的条件下，进行研制用桐油代替石油，试制植物油灯的试验；一面又进行自制小型压榨机，拟用以代替本地的土法制糖；此外还提出设想：联系地方建修小型水力发电站和将电机安装机轮木船，以利内河水上运输。但在当时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再加以国民党的独裁、专制，腐朽无能，老人的一腔宏愿，沥血呕心，只能是一筹莫展，一事难成。

李山甫老人，清廉自守，从抗日战争烽火中，返回乡时，除带回其平日积存较大量心爱的书籍、资料和矿石标本外，别无长物。好容易望眼欲穿，盼到解放，老人家真是说不尽的喜悦，深庆自己在古稀之年，尚能不负所学，有以报效国家和人民的机会。虽积存的书籍、资料，几经展转，已荡然遗散，但尚留存有亲自采集的不少矿石标本，都是建国所需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当即全部献赠给国家，由西南地质学院收存。所遗憾的是，老人终因年老体弱，于1952年遽然病逝，在其病故不几日，中央吴玉章同志还专人专函来内江看望李山甫老

人，并邀请老人家出席参加有关建设交通、开发矿业的重要会议呢！

祖母周剑秋，1882年出生于资中周姓世家，其父周如汉有文名，长于书翰；兄周鑫甫早年即留学日本。周剑秋在父兄的熏陶下，从小在家课读，知书识礼。1906年与祖父李山甫结婚，1909年亦随祖父去比利时留学，初入LIEGE大学攻读化学，1914年因欧战该大学停办，乃随李山甫到比利时首都考入比国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绘画。1918年以第二名优秀成绩毕业，尤擅长油画。1920年两夫妇从比利时返回祖国。周剑秋回国后，先后在成都高师教授美术课，并创办成都女子美术学校和担任了美术学校校长。学校里设置了美术（包括国画、炭笔画、水粉画、油画等专业）及音乐两系。后因军阀割据，成都政局动荡不安，兼以经费困难，女子美术学校停办。旋随李山甫去万县，全力协助创办万县贫儿工厂，并亲自担任教习。

祖母周剑秋，实为内江县最早的第一个女留学生。回省后，尤致力于女学的兴办。因其性情恬静淡泊，幼承庭训，虽海外生活多年，长期居留省内外大小城市，但端庄贤淑，生活谨严，不尚时髦，没有一些儿洋气。而且长于持家，子孙辈之教育，多赖以克成，诚祖父之最好内助。在其年老在家憩居时，除严格教育子孙外，则以读书、种花、作画自娱，极善摄生，因之得享高年。1982年成都市人口普查，列为全市23位百岁老人之一，市老年协会、省电视、广播台、成都晚报均为之报导，表示祝贺，受到党和政府的嘉赞和关怀。

二叔李济欧（美籍华裔、医学博士），在祖母周剑秋百岁寿辰，特从美国专程回归祖国探望母亲，给老人拜寿。

祖母周剑秋老人，不幸于今年以患胆囊癌不治逝世，当临终之时，仍谆谆教育后辈儿孙，一定要听党的话，努力学习，积极工作，更好地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服务！

（1983年8月）

▲李幼瑜同志：现系四川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副主任、营养师。

李仲权先生行状

王 恩 洋

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李仲权先生逝世于沱江中学，全校校董师生，极大哀悼，敬治丧葬，並囑洋述其生平以告于世曰：

先生名家模，内江人也，父逢机公，以文章政事，历游川鄂。先生幼受庭训，生有异质，童年为诗，惊其耆宿。初肄业于武昌蜀学校，文章已冠侪辈，会父歿于蕲春，乃偕兄君楷，返内江。祖无遗业，家事艰难，而志益奋。从宿儒罗仲武先生学诗文辞。时当西学东渐，思潮澎湃，先生虚心接受，遍读严几道诸人所译书，提倡新学，为邑人先。后读章太炎先生书，始知有佛法。感人世之无常，求为究竟学，得佛书，辄忘寝食以读之。由是思想益深邃。年二十二，任内江县立中学国文教师。逾年受县人托，赴江浙考察教育。谒欧阳大师于南京支那内学院，广请佛经以归。再任内江中学训育主任，转顺庆联合中学训育主任。当时社会纷纭，教育随政变党争扰攘无宁日。先生觉非超然自立，纯粹以学说为重心，不足挽教育之颓风，而造真实之人才。乃于民十五年。与邑人黎灌英，钟白心等办内江公学于水巷

子。两年之中，迁四校地，艰苦极矣。会李君子静，子奇自宁沪归，一见倾心，志行投契，因而共同创办沱江中学，勤劳筹划，于今十有七年。历任校务主任，住校校董，及教师，未曾一日离校。财力支持，校董诸君之功。教诲训导，教职员诸君之力。而专志不懈，一心经营，则先生之诚愿特著，此众所共许者也。今者沱中男女初高及附小各部学生，年达千人，先后毕业已近万人。校舍宏敞，校基稳固，方期更向光明俊伟之理想目标迈进，有待于先生之领导者至巨，孰谓其遽辞其多年同志及住校员生而悠然长逝矣。

先生文学，富有天才，所为诗，清健古劲，在太白东川之间。骈体文直追晋宋。顾既志在人心学说，不欲以诗文自见，知之者除邑之人盖甚寡也。先生于书，无不读，汉宋儒者，周秦诸子皆能入其堂奥。而二十年来，尤究心佛法，初学禅，共邑人张子堂先生习静坐，兼治天台、贤首之学。顾有疑，弗能解，曰读洋起信论料简，而群疑顿释。洋讲摄论于成都，先生偕廖泽周、梅楚南来听讲，自是益肆力于法相、唯识之学。思想之精确、胜解之决定，吾闻人颇多，盖寡其俦也。先生既笃信佛法，因思以济人，（民）二十六年办沱江佛学研究院于香山。三十年与廖泽周、张介眉，陈戒于延洋来内江共办东方文教研究院于圣水寺，得黄肃方、余次青、张绍甫、罗筱园诸君之助。今文教院亦既基础粗立，事业渐兴，将以实现先生复兴民族、和平世界之宏愿，谁谓弗能目睹其成哉。悲夫！先生生于壬辰年后六月十六日，享年五十三，初娶妻叶仲雅，四年而卒，继娶妻张应兰，今十年矣，皆无出，抚其兄女之子懋衡，以承李氏禋祀。先生之嗣胤虽不繁，而门前桃李，郁郁葱葱，及其愿力之足以荫庇人寰者，固将久而不朽。生平著述诗文若干卷，付其弟子刘南华，足以传世无疑也。三十四年六月七日南充王恩洋谨状。

△王恩洋先生：原四川东方文教院长、佛教学会会长。

李仲权先生办学、治学记略

吴星海

李仲权先生少年时，即勤奋好学，曾从县耆宿罗仲武国学名师受业有年，与同窗廖划平、韩文畦等互相砥励，极为密契，经史文词，各有其长，在地方曾获得罗门“三大弟子”（亦曰“三大学士”）的时誉。

在“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启蒙、指引下，对立志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新兴的理想，有着强烈的追求。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期，李仲权先生与内江第一批共产党员黎灌英（与先生是连襟）、廖释惑、钟白勋（心）等同志志同道合，感情深厚，交往甚密，因深感教育事业之重要，乃于一九二六年春，共同创办著名的“内江公学”于水巷子李氏宗祠。校长黎灌英，既是内江共产党的创始人，内江特支的第一任书记，又是当时左派国民党内江县党部的负责人。一九二七年一月的内江左派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内江公学召开的。共产党员廖释惑、钟白勋、谢独开等为县党部的执行委员，而先生则为县党部的监察委员，都是内江公学的教师。当时的内江公学成了当时内江革命活动的中心，每逢节日，还组织学生上街或下乡进行讲演宣传，散发传单，政治空气十分浓厚，中国著名记者，共产党员范长江同

志，就是当时内江公学的进步学生。一九三九年六月，范长江回内江时，曾专程拜访了仲权先生，而先生亦常以范长江曾是他的学生而感到自豪。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内江的反动派也举起了屠刀，一九二七年五月反动派明令撤销了内江县左派国民党县党部，随即派兵搜查了内江公学，内江公学被视为共产党的活动中心，不久就被迫停办。

先生立志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以作育人才的愿望，成了泡影。正在徬徨苦闷之际，适逢内江殷商李子静、李子奇兄弟自上海返回家乡，对先生“教育救国”的理想，十分钦佩，并愿大力支持，捐献资金。乃于一九二八年开始办起沱江初小，附设幼儿园，不久又增办高小，成为完全小学。旋即又办初中，再办高中，成为一所完全中学。由李子奇任校长，先生任教务主任（另有教务主任），兼任校董及国文教师。先生志在办学，不图名，不图利，从不出任校长或董事长，但众所周知，他是沱江中学的实际主持人和创始人。勤劳规划，苦心经营，多方奔走游说，策动热心教育人士捐献和集资，终使学校基础日益巩固，规模日益宏大，校舍宽敞，经费充足，师资优秀，在校学生多达千人，而且学风淳朴，学习空气浓厚，学生成绩优异，升学率很高，远近驰名，深得内江人民的称赞。

先生办学，并不以此为满足，又于一九四一年延请四川南充王恩洋先生来内江共办东方文教研究院于圣水寺。王先生原是武汉大学教授，对诸子百家、宋明理学和佛学都有研究，有不少著作出版。除王先生主讲国学外，先生则讲授古典文学，特别是乐府诗，深受学生欢迎。

正当沱江中学兴旺发达，东方文教研究院初具规模之际，又当八年抗战即将胜利之时，先生不幸身染伤寒，一病不起。全校师生员工以及各界人士，无不哀悼，为其送葬者数千人。先生墓在沱江中学校园内，墓志为其好友韩文睦先生所撰写。先生初娶叶仲雅女士为妻，四年而卒，继娶前清举人张大鼎之三女张应兰女士为妻，得以偕老，先生虽无子女，但门前桃李，郁郁葱葱。先生死后，因沱江中学校基已固，一直兴盛不衰，直到解放后由国家接收改为内江二中，而东方文教研究院，则因师资缺乏，迁往成都西郊，解放后并入四川大学。先生办学一生，桃李满天下，现在在祖国各地为祖国四化建设服务的沱江中学毕业生，当数以千计，而此数千学生之中，已有不少杰出人才，先生作为一个教育家，理应受到人民的怀念。

先生除办学、讲课之外，也醉心于学术之研究，哲理之探讨。对周秦诸子，宋明理学，中外哲学，均喜涉猎，遇事追求真理，探索究竟，不失为学者之风。可惜当时是反动派统治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接触不多。先生晚年，自称喜爱印度哲学，实际就是佛学。一九三七年先生曾开办沱江佛学研究院于香山（即资圣寺）。先生对诸子百家学说、宋明理学和佛学，都作为学术进行研究、探讨。

先生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十分渊博，对于古典诗词和骈体文的创作，尤善研习。他好读诗，也爱写诗，他的诗，意境飘逸，风格清新，间有豪放之作，有太白之遗风。生平著述诗文若干卷，逝世后，由其学生刘南华先生和其好友王恩洋先生整理出版，名《雅存诗集》，由王恩洋先生作序，公开发行。先生诗多歌行，其次是律诗，绝句较少，有的富于哲理，有的富于抒情，有的又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如倭寇篇，淞沪战歌等长诗）今选录短诗三首于后。

《惊轰炸中又频警变》（七律）

心侵百感乱如麻，敌鹤才惊盗又哗。
天下兴亡元帅责，闾阎靖扰细民嗟。
公私交顾方持国，匪寇俱横哪可家。
涉世早知波浪恶，济群无术鬓空华。

《秋月花下独酌偶题》（七古）

云边买酒归来早，满地落花红不扫。
洞庭月色压莲舟，賒来照我花前秋。
月白花红酒郁郁，清风皓露虫啾啾。
兴来且作蜿蜒吸，消我万古之长愁。
举杯向天饮明月，愿君照我生华发。
淋漓复酌饮花仙，愿君香入九仙骨。
千斗万斗饮我影，愿随花月同生歿。
酒酣月落海东头，梦魂犹自绕花游。

《古剑歌》（七古）

天空霹雳风雷吼，大江波涛耀星斗。
神物水底久昂藏，电火围烧乱腾走。
忽然化剑轰烟尘，龟文龙鳞纷满身。
七彩九华玉为饰，雷焕胆落延平津。
从此宝匣藏神剑，时时常见吐光焰。
欲出每作哮虎声，百灵奔蹶鬼神惊。
我得神剑将如何？闻鸡起午莫蹉跎。
学成长在腰间挂，工夫愿费十年磨。

仲权先生作为一个教育家、学者、诗人、爱国主义者、忠厚长者。高风亮节，高山景行，确足以为人师表。他的好友王恩洋先生曾为先生书题像赞，其词曰：

“忠信其人，清华其诗，滔滔其辩，
渊渊其思，而淡泊守素，不愠无知。
勤劳建学，沱水之涓，训诲生徒，
情结深慈，死而后已，亵乎人师”。

短短十二句，不足五十字，却对先生的生平和德行，作了高度的概括。

名医熊其言及其医学著述《宿食论》

郑邦达

熊其言，字仿明。生于清末（？—1928），内江县人。家贫，以孝友闻于乡，授徒为生计。初试童生，名列前茅；旋补诸生、序拔贡、试举业不售，乃设塾于内江，先后应教于自贡、渝城两地，时以医道济人。

先生精究岐黄术，尝著《宿食论》。是书系从东汉张仲景《金匱要略》①、《脘（同疣）满》、《寒疝》条下，独取“宿食”一节，提纲挈领，条分缕析，辨证精详，有清二百余年以来，对仲景学说有阐述者，在内邑未之前闻。

《金匱要略》是张仲景《伤寒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是我国历代中医研究“杂病”的重要古典医籍之一。《宿食论》从《伤寒杂病论》中《脘满》、《寒疝》、《宿食脉证第十篇》，加以阐述成书。作者“穷年矻矻（音枯），期有以推求一致”，勤求古训，博采各家，在《内》、《难》经义部分，引用经论有关条文，并选录先哲名言四十则（自汉代华佗至明代王肯堂、徐洄溪各家②），从理论上极大地充实了《宿食论》内容，为中医研究“肠胃病”提出了宝贵的经验。

“宿食”作为内因重点疾病，早在《内经》、《难经》中已有论述，张仲景《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谓：“清邪居上，浊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里。壅（同壅、谷之别字）饪之邪，从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食伤脾胃。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痹论》）“饮食寒热，感则害于六腑。”（《阴阳应象大论》）“饮食不节，起居不时，阴受之；阴受之，则入五脏；入五脏则填满闭塞一下为餐泄，久为肠癖”（《太阳阳明论》）。“五脏不平，六腑闭塞之所生也。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通评虚实论》）“腑病者，仿佛贲响，上下行流，居处不常”，（《难经·五十二难》）

作者在《绪论》部分，引伸其义。如：

1.五邪可以眩（音该）百病，而百病不外五邪。虽五邪中人，各有法度，其最易为感触者，惟宿食为尤甚。

2.不曰“伤食”，而曰“宿食”，盖以病情变幻，至宿食而已极。

3.人体之气不通，必有停积之虞。斯食之为宿，皆内气之不能通，故食下咽而气不化，则碍于脾胃之道，而宿为之灾。

4.而壅饪之邪，导致脏腑病变，则十分复杂。

《自序》中扼要地指出：“后天水谷，赖有先天之元气。敷布环周，乃得散神液而传糟粕。气既为阻，食亦滞而不化。蓄积肠窍，存而不泻，蕴毒生孽，势必由里达表，而与之相助为虐。是内外等因之旧病未已，而宿食不化之新病复起。则欲治此内外等因，必并将宿食殄灭，内窍得通，外窍始能舒畅。”

由此可见，“宿食”一证，导致脏腑经络病变之多端，绝不是历代注家谓“宿食即伤

食”的简单概念。关于“宿食”的治则，作者谓“宿食着眼处，全在于认证。苟知其邪之所在，尤不得以泛常不切之品应命，并致用相反之药，冒昧施治”（即辨证论治）。

作者在论中详列治法，博采众方，务求理、法、方、药，得心应手。又选录古今名医验案三十六例（包括李东垣^①、李士材、戴元礼各家），治愈病案八十例（其中有郑光远四例），从实践上充实了《宿食论》。作者自谓是书虽为“宿食”而设，实可羽翼“伤寒”、“卒病”及一切“杂症”，良非虚语。作者在附论中，对以下各病尤具创见：

1. 小儿麻疹，不能株守成法（常法宜寒凉，变法宜温热）。

2. 小儿慢脾风，谓逐寒荡凉治于已病之后，不如辨证于未发之前。重用“理中附子汤”加减等法。

3. 读《瘟疫论》之阐述。

4. 治痧症必顾及“宿食”。

5. 治白喉以荡秽除实为第一要务。

6. 绪论小儿盘屎脐风，无异于宿食风寒。关于经验良方，载有疗效可靠，应用方便的部分处方。

先生之医，源出于《内经》、《难经》、《伤寒论》、《本经·脉诀》，旁及《千金·外台》，博览古今医籍，手不释卷，于金、元四大家，独许李东垣《脾胃论》深得仲景“存津液、保胃气、脾阳不受邪”之旨，谓张从正等辑著的《儒门事记（亲）》^④主汗、吐、下法“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深得先师治病要领。但李东垣《脾胃论》，虽为中医胃肠病研究之重要著作，尚有其不足之处。如喻嘉言^⑤所谓“守东垣（李杲）之说，遇胃病者咸用补法，其有愈补愈胀者，正坐此弊。”

《宿食论》“循流讨（导）源，察标求本”，精究脾胃运化之功能，为“通腑法”尽调畅之治则，正可以补《脾胃论》之不足。明李灏作《李杲（搞）传》谓“有志于医学者，必尽读东垣之书，而后可以言医。今《宿食论》出，则相得益彰矣。”

《宿食论》《自序》有云：“窃思年及二毛^⑥，未获稍有建立。以康^⑦济时艰，即使日疗一人，月痊数病，于世已无所补，况顾此则失彼，虽数十里之近，尤难兼及，又何论千里而遥，百世而下乎。……重以粗工碌碌，未能见病知源。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清温滋补，杂药乱投，茫无法纪，至濒危以歿，有不知为何病者。……嗟乎！遗《经》具在，良法并亡，恐自今以后，不复有生人之术……”

书成，由渝城李君荣春为之刊行，已无存本。第二版为木刻本，于清宣统元年（1909）印行三百部，全书计六卷，凡三百二十九页，都十余万言。一至三卷，条解“宿食”原文，引论《内》、《难》比美“满症”，综述变证；四、五卷为“医案”；六卷为“列方”（现仅存一部，乃先母请托张世钧兄保存至今，深表谢意）。

先生曾任内江县慈善会会长^⑧，在善举中，有“施药”一项，亲自主持，每年配制膏、丹、丸、散所用中药在万斤以上，按时分配四乡，为送诊贫病之用。

施药中治内科之内服丸类，则有“五色丸”，每包丸分“正、佐”两种（如“正黄丸”、“佐黄丸”，治脾胃病；“正青丸”、“佐青丸”，治肝胆病；余类推）。膏类，有“清阳膏”、“数阳膏”、“金仙膏”、“六台膏”，用于外科各种疾病。治痧症则有“仙传济世丹”，治时疫则有“青囊丹”等。妇科另有专药，小儿疳疾则有“神化丸”。针灸则有“太乙神针”

等，用药计三十余种，其方，部分载入《宿食论》《经验良方》中。十有余年，所活者众。先生济世活人之心，亦可谓得偿夙愿矣！

先生尝谓“医可通仙”。潜心释道，尤工于诗。晚年隐居“华萼寺”（唐、状元范金卿读书楼遗址），著《药玄诗》三百零六首，因别号“华萼三六居士”。诗为“七绝”体，每句内均含有一种药名。

前人以药名入诗者，大都为游戏三昧之作，例如“‘云母’帐空人不见，水‘沉香’冷月‘蟾娟’”之类作品不多。

先生之诗，正如其《序》所云：“推敲极一字森严，敢谓口诛笔伐；讽咏陈万夫疾苦，聊为泄愤鸣冤。……”诗以言志，孤愤之情，于兹可见矣。

1926年，《药玄诗》曾在沪铅印一千集，分为上下两卷（线装本），今则片纸无存。仅忆其二绝：

1. “子规”啼彻四更时，起视“蚕稠”怕叶稀。

转惜“天明”犹未晓，“梧桐”宿鸟各分飞。

2. “牡丹”尽爱艳开时，别买“胭脂”画几枝。

惟有“东风”无世态，百般“红紫”一般吹。

先生还有《遣怀》一首：“满座春风陶蚁术，半窗红日写禽经。翩翩白鹤云中舞，不受金球暗击惊。”

仿明翁为余先外祖父，童年亲承教诲，稍长即授以岐黄之术。翁之一生，难能可贵者，穷不改其志，孝友重于乡，著有活人书，行多慈善迹。诗人晚景，傲骨清神。身当清末民初，历尽艰难岁月，盖棺论定，一介寒儒。就其《宿食论》一书，已可留名医史。

笔者自愧滴露乏添江之益，轻尘无足岳之能。略忆二三事，以见管窥，于翁济世活人之心，聊表永志不忘之意云耳。

郑邦达 时年七十又一

（1983年9月13日于内江专区第一人民医院）

编者注①张机，东汉枣阳人，字仲景。灵帝时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尝学医于张伯祖，以族人死于伤寒者甚多，乃著《伤寒杂病论》，其书散失不全。东晋王叔和搜集旧论，辑为《伤寒论》及《金匱玉函要略》，后世习医者多宗之。

②华佗（？—208）汉末医学家。又名旉（敷），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因不从曹操征召，遂为所杀。所著医书已佚，现存《中藏经》是后人托名之作。王肯堂（1549—1613），明医学家，字宇泰，江苏金坛人。早年习读文史，兼精医学。编有《证治准绳》四十四卷，后世汇刻称《六科准绳》。又编《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共收历代医学文献四十四种，保存了不少历代医学文献。

③李东垣（1180—1251），金医学家，名杲，字明之，号东垣老人，真定（河北正定）人，从张洁古学医。著有《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等。所著《脾胃论》三卷，书成于南宋淳祐九年（1249）。本书着重论述脾胃对机体生理、病理上的重要意义，对内伤杂病学说作出了贡献。

④《儒门事亲》中医药书名。金、张于和与麻知几、常仲明等辑著，十五卷，书成于十三世纪二十年代。其内容阐述运用汗、吐、下三法治病的理论和临床经验，并列举了各类病二

百多例来说明其攻邪治法的疗效。张子和（1156—1228），名从正，号戴人。金、医学家，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东）人。切责医者滥用补药与平稳药贻误病人之非。

⑤喻昌（1585—1664），清初医学家。号嘉言，新建（今属江西）人。后在江苏常熟行医。著《尚论篇》、《尚论后篇》，对《伤寒论》及后世注释，加以评论阐发。又著《医门法律》，论述杂病的病机和治法，后附《寓意草》，记载临诊医案，提倡先议病，后用药，重视辨证施治。

⑥二毛，指头发斑白的老人。

⑦韩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东汉京兆霸陵（今陕西西安东）人。常在山中采药，到长安市上出卖。桓帝派人请他做官，遂逃入霸陵山中隐居。

⑧内江县民国初年慈善会与收支所、兵差事务所同属三费局，于1922年奉省财政厅成立地方附加税收支所，慈善会始正式分立。

著名中医段训、段静庵父子

凌家区卫生志

段训、段静庵父子俱邑西名中医，世居张家场外大田边。静庵秉承家学，长于中医内外科，兼习按摩、针灸，名噪于清末，治病多奇中。

初，段训以长子病，屡求医不治。时清代道光年间，邑境多故，县太医院名医赖庇隐于乡，延之诊视，仅以黑丸二、三粒即告痊愈。段训遂师事于赖，遽囑赴京师购医籍以求深造。途中捧读所购书，船行大江，逐页读竟遂尽投河内，抵其家而医书已荡然无存矣。赖师怪而问之。曰：“书在腹。”寻章摘句抽问，无不了然于胸。赖师大奇其悟性之异，尽授所知，医名遂远播遐迩，候者盈门，皆著手成春，活人无算。

乡中有林生者，夜读就枕，屈卧则醒不能伸，伸则不能屈。如是数月，医皆不治，延段训视之，断为“阴寒伏于肝、肾二经”，乃慰生曰：“足下两尺无力，其病在筋，筋者肝所属，故屈而不能伸；其病在骨，骨者肾所属，伸而不能屈。是不难治，法宜温以散之，首服‘麻黄、附子、细辛汤’，以引经减痛，次服‘暖肝煎’病将爽然失矣。”林生之病果脱然而愈，医林无不叹其术之神也。

段训次子段静庵，清末民初，以家传儒医，悬壶于内江城内“天生元”药号，诊断精当，验案确切，极负盛名。

凌家场张生之妻患喉症，以其妹罹喉痛而歿，疑系传染，举家大骇。延静庵诊视，上下凝睇，默察病容，情态非常，喘息艰难，两尺欲绝。即挥毫立“八味地黄汤”以付张生，生惊囑曰：“孕已四月，桂、附下咽，虽疗喉痛，于胎如何？”静庵谓，“《经》云：‘有故无殒。又云：’‘有是病则病受。’今两尺欲绝，所施桂附以生其元阳，岂拘于‘胎前宜凉’之说乎？况少阳之脉循喉，虚火上浮亦喉病，苟不以桂附引火归元，而以生四物安胎，或知柏以降火，则元阳绝，喉咙肿，胎速殒而残，尚可延乎？”方剂一服，喉痛若失。张生敬之若华扁，时人于段氏父子之医术至今犹称道焉。

（谭福文摘自《凌家区卫生志》上篇）

· 江城书画舫 ·

五、公孙长子的魏碑方笔与双钩、飞白

世俊

辛亥革命老人，老同盟会员公孙长子先生，早年曾努力从事于推翻清朝帝制旧民主革命运动。民元后，即息影政途，客寓上海、成都、重庆等地，专以研习书法、鬻字为业。

公孙长子先生，姓余名培初，又名余切。在其为人作书落款时，则多用“公孙长子”署名。据云取名“公孙长子”之来由有二：一为从事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时，表明自己是轩辕黄帝公孙氏的后代，黄帝的子孙；一为在操习书法上时，有如唐、草圣张旭，观公孙大娘之舞“剑器”，而书法锐进，借以自喻也。

公孙长子的书法，以善书魏碑方笔为主，而对双钩、飞白则尤称绝妙。其所书“双钩”，不论行草隶篆，无不运笔自如，得心应手。在其常为人题写自作诗句中，即留传下有：“双钩自我传绝调”（自负其双钩，乃直接继承于古女名书法家，善书双钩的卫夫人。）；以及尚有“日作双钩三百字，半是佛经半艳情”等隽逸诗句。“飞白”亦称“飞帛”，言其作书的点、画丝丝露白，有如布帛之迎风飞舞。公孙先生，早年所作飞白，则略异于古人所作之“飞白书”，是师古人法，而有所发展、创新。

约在四十年代期中，公孙长子回到内江故居城郊小住，有一外地下江客人，路过内江。见城里装裱店，裱裱有公孙先生的飞白书和双钩条幅，极为惊疑。认为所钩之字，是映底摸写而成。询之装裱店家，乃告之全系平手脱勾，并非摸拓。客人欲求亲睹，以广眼界，托店家敦请先生移步客寓（原民乐大厦）当面作书，润笔从丰。先生很不以为然，本不愿理会。但为释客疑，始允之。随嘱人将纸笔墨砚携至客寓，当着客面亲自命笔。未几，即将“双钩”、“飞白”二体条幅写就，真是笔笔如春蚕吐丝，绵绵不绝之气，贯于满纸字里行间。客深为叹服，对先生献烟烹茗，格外执礼恭敬，将求得先生所书之双钩、飞白字幅，视作极为珍贵的墨宝。

公孙先生所书之魏碑方笔擘窠大字，为乡人称道不已的，有内江城里上南街，原喻培伦大将军纪念祠大门上的匾书“喻大将军祠”五个扁书大字，气势豪放，金碧辉煌，街头来往行人，路过于此时，无不驻足、抬头凝神观赏。

六、余燮阳先生的榜书和宗法“兰亭”

农治、世俊

书法名家余燮阳先生，原内江县人。在少年读私塾时，即受到县里颇具书法盛名的肖玉林老师的亲切指导，加以自己肯刻苦习练，写得一手方正、工整，最讲规矩的“台阁体”（亦称翰林体）。因之，很早便打下了精于书法的坚实基础。清末考上秀才后，复去成都尊经书院续求深造。因书法特优，当即被书院主事霍老先生的举荐，去北京清室军机处充任章